

第一章

久有凌云志，适时露锋芒

“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翼亮贞文德，丕承戢威武。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作为与李世民同一时代的诗圣杜甫此诗虽有歌功颂德之嫌，但对李世民一生的概括和评价却是令人信服的。

身为纨绔子弟的李世民，在其家族传统教育和光宗耀祖理念的熏陶下，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所处环境铸就了他的灵秀之气。他生长于乱世，在群雄逐鹿、英雄迭生的时代以武功启动，摸索着历史发展的规津，在跌宕起伏的社会斗争中走向成熟和成功。

1. 玉成虽系天然 成器仍需细琢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李世民一出生就注定了他一生的不凡。这样说也许有些宿命论的嫌疑，然而由于一个人的天资高低与其个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所接触的思

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假若一个人的父母为人中精髓，在很不错的境地中长大，而他本人又天资聪慧，好学向上，这样的少年不成功不成名才让人觉得奇怪呢。

这就要说到李世民的出身了。据《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太宗生于武功庆善宫。”武功庆善宫坐落于渭河平原上，它南临渭水，东连隋都长安。李世民曾于“贞观六年，銮驾亲幸，宴群臣赋诗”，他的诗中说：“寿丘惟旧迹，丰邑乃前基。粤予承累圣，悬弧亦在兹。”说的就是这里。

李世民是在隋开皇十八年（公元 599）十二月戊午出生的。父亲李渊，爵为唐国公，新任陇州刺史，当时刚从谯州卸任，尚未到陇州。武功只是李渊赴任陇州的暂居之地。

李世民的先世一直是关陇贵族。八世祖李暠，在十六国时据敦煌、酒泉为王，建西凉国，自称凉公，即凉武昭王。六世祖李重耳，北魏时曾任弘农太守。李重耳之子李熙为金门镇将，镇武川，全家定居于此。曾祖父李虎任北魏左仆射，被封为陇西郡公。祖父李昞，曾任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爵唐国公，史称其“为政清简，甚获当时之誉”。

隋文帝代周而有天下后，李渊补千牛备身。而且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李氏家族同杨氏家族的这种嫡亲裙带关系，使李渊在政治上的发展处于有利地位。他因而历任谯州、陇州、岐州等州刺史，大业初年又先后为荥阳、楼烦两郡太守，并任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等职。可见，“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祚，姻娅帝室。”此言不虚。

对侯门将子的李世民来说，近二百年的贵族积累，不仅在财富上的，而且在思想上和政治见地上也有积淀，正可谓得天独厚，在无与伦比的物质和精神富海中尽情畅游。

谈及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和父亲李渊的结合，还有一段不可遗

漏的趣闻。窦氏出身于鲜卑贵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她的继母为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从小为周武帝抚养，深得宠爱。父亲窦毅见女儿才貌非凡，认为“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便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来求婚的人，给两支箭，从门屏后面射中孔雀眼睛的，才允许婚配。如此这般，前后有数十求婚者皆未能中。李渊后至，两箭各中一目，窦毅非常高兴，于是将女儿许配给了李渊。

遗憾的是，窦氏却在大业九年（公元614）在涿郡过早地去世，时年四十五岁。窦氏对世民最是宠爱，所以李对母亲的感情也最深厚。李世民即位后，“过庆善宫，览观便殿”，并对大臣说：“腾生于此，今母后永违，育我之德不可报。”对母亲的深深怀念可见一斑。

窦氏共生四子一女，四子是建成、世民、元霸、元吉。当时人们习惯地称建成、世民为“大郎”、“二郎”。李渊为儿子所取之名自然蕴涵有建功立业、济世安民之意。

在大业十年，三子元霸夭亡时年仅十六岁。一女后来被册封为平阳公主，嫁给了临汾柴绍。在李氏兄妹中，除元霸外，其余三男及平阳公主皆为统一全国、建立唐朝伟业的重要人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广泛移居中原、胡汉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李氏家族长期居住在陇西、中原或关中地区，和各少数民族交往接触频繁，他们数代所仕之北魏、西魏、北周王朝，都是鲜卑人的政权。因而不但对鲜卑人的风俗习惯及文化有着较深的了解，而且深受影响。他们不但接受了西魏所赐的鲜卑姓，还和鲜卑人互通婚姻。除了李渊之妻窦氏外，还有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李世民之妻长孙氏等都是鲜卑人。所以说李世民一家是北方民族大融合时期汉与少数民族混血的家庭一点也不过分。

从家族史上说，由李勣到李昫的兴衰交替，说明这个家族是根底很深的军事贵族，因而这个家族中均崇尚武功，子弟自幼就演习弓马、熟读兵书，若有战事发生，就带兵征战。军功是军事贵族子弟晋升的阶梯。他们往往因拥有军权而在政治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长期分裂割据的年代，李氏家族或者割地自王，如李勣王西凉；或者参与改朝换代的政变，如李虎佐周代魏；至李渊这里，则亲眼目睹了杨坚篡周的事实。在上述年代中，李氏家族经历复杂，沉浮无常，种种经历使这个家族富于得天独厚的冒险精神，并由此而孕育出政治上的野心。

我们已经知道，李氏家族同杨隋政权的杨氏家族有着亲密的世传裙带关系。杨坚的祖先曾在北魏时出镇，移家武川，与李氏先世经历大致相同。杨坚的父亲杨忠，与李渊的祖父，也即李世民的曾祖李虎同为北魏“八大柱国”之一，而且居于同州，平时过从频繁。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时，杨忠被封为隋国公。后来杨坚与李昫成年，各娶独孤姐妹为妻，两家进一步联为姻亲。李昫死时，李渊年幼，杨坚对这位姨外甥加意照顾。

及至杨广杀兄弑父时，李世民年已七岁。因李渊与杨广是姨表兄弟，李渊年长三岁，其甥女王氏又为杨广的后宫，因此杨广称帝之后，李渊的地位并未有所改变。李渊在隋朝虽任过多种官职，但由于李昫的早亡和杨隋政权对关陇贵族的防范、打击和排斥，而一直未能进入枢要的行列，这使李氏家族在仕途上产生一种不得志的抑郁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李渊给儿子取名建成、世民，不仅是对后辈的期待，也包含着他本人不满于现状的情绪。当然，由于裙带关系，李渊在杨隋朝廷中的地位总体上来说毕竟还是比较优越的。而且转机最终还是从远方到来了，大业九年，李世民已十六岁，李渊由

文官而转为武官，并一再升迁，这对于一个军事贵族的后裔家庭来说，意味着辉煌的人生命运对他的最终眷顾和垂青。

这期间，李渊少不了要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雄心大略灌输给几个儿子，而儿子们又继承了李氏不安分的血统。

少年李世民正一步步地向大业靠近。

2. 齐家是男人立业的前奏 良好的婚配是成功的一半

婚姻使李世民从少年走向青年，从幼稚走向成熟。

封建社会中的人们非常看重婚姻的作用，正因为看得太重，婚姻的决定权并不掌握在缺少见识的青年手里，而在于父母。

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思想中，一个男人若不成家续后，则为不孝之首。而作为自然人，男婚女嫁，完成人类的自身生产，不仅是人的本性使然，也是人本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封建社会，像李世民这样十六岁就结婚的，尚属于晚婚之列。

这一年是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 614），十六岁的李世民与长孙氏结婚。长孙氏是河南洛阳人，其先氏源于北魏族拓跋氏，因担任过宗室长，故移姓长孙氏。她的祖父长孙兕，曾任北周左将军。父亲长孙晟，则为隋朝右骁卫将军。可见，长孙氏家族与李氏家族一样，都是军事贵族名门。因而李世民和长孙氏的结合，自然也是门当户对。在封建社会，通婚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以此来拉拢关系，扩大势力范围是常有的事。

上帝总会眷顾幸运的人们，从而使他们更加幸运。譬如，地主家有钱，总拣目力所及中最漂亮、最聪达、最贤慧的女子为妻，世代相传，其后代总是长相好、最聪明；又譬如，儒生家有学识，总与有学识的家族联姻，家中的后代又总能生活在有学识的圈子中，因而

更具成才的天赋与教养。这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的事。

娶了长孙氏，的确是李世民的幸运。生活在贵族的阀阅门第的长孙氏并非碌碌女辈，在家庭和环境的熏陶下，尤其喜文。幸运之神的眷顾体现在长孙氏的这种资质与李世民的尚武相补短长，刚柔相济，为日后夺取政权，治理天下作出的贡献不可估量。

长孙氏喜文的原因与其哥哥长孙无忌的教导不无关系。原来，长孙晟病故后，长孙氏和哥哥长孙无忌境遇孤单，被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高氏是渤海著名的衣冠右姓，从曾祖到父辈历任北魏、北齐、隋朝显官。高士廉素有才望，颇涉文史。在这个家庭教育下，长孙无忌“好学涉博文史”。长孙氏也理所当然地养成了与李世民迥然有别的“好读书”、“循礼则”的风习。通过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姻关系，渤海高氏就又被牵入关陇集团之中了，关陇集团也因此而得以壮大。

由于长期生活于中原和关陇地区，而统治这一地区的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又都为鲜卑贵族所建，因而李氏家族同以鲜卑族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接触十分频繁，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社会风俗，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受到较大的影响。

李世民的祖辈及其本人多与鲜卑族通婚，说明当时民族之间的差异在逐渐消失，文化基本融为一体，这实际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自然归宿。

在封建时代里，婚姻的成功与否，将左右每个人的人生轨迹。综上所述，李世民的婚姻是一个好的征兆。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后来的贞观之治时代，长孙氏不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内助，而某个时间某个环境下对朝廷事务的理解和“干预”更为“贞观之治”的光彩之笔注入了神力。

从古到今的社会实践表明，一个男儿要想干大事，缺不了这个。

3. 客观虽然优越 还得仰赖于个人的努力

山水日月给人以灵秀之气，社会兴衰启人睿智之性。此话说的是经历和环境对人的塑造，讲的是客观条件论。

少年时代，人的可塑性强。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少年时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人所常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因果内含。

启蒙时期的李世民，是个聪慧的孩子。他酷爱读书，喜好历史、文学和书法，练得一手好字。因是军事贵族子弟，又必然接受军事知识的教育，从小就演习弓马，驰骋猎场。他身强力壮，所射之箭，比一般人用的要大一倍，而且武艺精湛，在百步之外，能够“射洞门闾”。

李世民所受的军事锻炼是比较严格和全面的，除了识字读书、操练兵器外，还要诵读兵书。李世民常读的有孙武注的《孙子兵法》，少年时就能用孙子之言和父亲谈论兵策。每次谈论都有他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由此可见，他的叛逆个性初现端倪，而且来自于独立的思索。

我们已经谈到，李世民是在父亲赴任途中在武功庆善宫出生的，以后随父亲历经陇州、岐州、荥阳、楼烦等地。直到十四岁才到了京师长安，至十六岁。在这段不安定的生活中，他饱览了各地的河谷山川、军事要塞，又接触了各地民情风俗，了解了许多社会现实情况。这使他的成长有别于一般安居深府的贵族少年：见多识广，眼界开阔，养成了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他平时头脑冷静，处事果断，并有远见卓识，足智多谋的才华。非凡的游历犹如一笔宝贵的财富，使李世民自小就有了很强的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

少年时期的成功和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世民的叔父、堂兄弟中有许多善治军事的将才，如江夏王李道宗、河间王李孝恭、淮安王李神通，都在李唐王朝创业过程中建有军功。淮阳王李道玄，十五岁从征，勇猛善战，所射之人无不弦而倒，十九岁时战死。

就李世民的同父兄弟而言，其中也多见文武之才，如：

李建成，李渊长子，太原起兵时任左领军大都督，后又在消灭刘黑闥叛乱中立下战功。

李元吉，李渊第四子，太原起兵时授十五郡诸军事、镇北大将军。

李元昌，李渊第七子，自幼好学，善隶书。

李元礼，李渊第十子，少恭谨，善骑射。

李元嘉，李渊第十一子，少好书，聚书至万卷，又喜探碑文古迹，并多得异本。

李元轨，李渊第十四子，少多才艺，从太宗游猎，遇群兽，矢无虚发。

李元裕，李渊第十七子，好学且善谈明理。

李元夔，李渊第十九子，少有美誉，善音律，工草隶。

上面所列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及三子李元霸皆为窦氏所生的同胞兄弟。李元霸早年夭折，民间传说他是隋末的第一勇将。传说虽然夸张，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李家子弟大多能文能武。

若说李世民的成长，在少年时代主要受家族的影响的话，那么一进入青年时期，即到了隋炀帝大业九年，他十六岁以后，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自我的修造了。而且正是在他十六岁这一年，隋王朝刚刚度过三十二个年头，社会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动荡，时代的洪流将李世民推上了一条特殊的发展之路，他也因此而干出了举世瞩目的大名堂。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4. 机会只钟情有准备的人

站在当今社会来观览历史，不难发现李氏父子取隋建唐的成功，在于他们及时地抓住机会，在第一时间内果断而绝不拖泥带水地付之行动所致。而这个机会，也是他们素质和智慧的感悟结果。社会更迭、朝代变换的历史经验表明，若没有精透的分析，超人的胆识，在忠君思想束缚人心的封建社会，去揭竿而起的，只能是傻子和疯子。

公元 581 年 杨坚代周而建立隋朝 至公元 618 年隋炀帝被杀于江都，从始至终，仅有短短的三十七年。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于公元 611 年，距隋文帝始建国，仅有三十年。

隋朝处世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也有过兴盛和繁荣，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使隋朝拥有了巨大的财富，短短的几十年间储积了极为丰富的粮食。杜佑就曾说过：“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至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直到贞观十一年，西京府库的储积为唐所用，尚未用尽。此时隋朝已灭亡二十年了。

公元 589 年，隋文帝杨坚灭掉南陈，结束了自东汉以来四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开创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新局面，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二十年来，杨坚“躬节俭，平徭役，仓廩实 法令行 君子咸乐其生 小人各安其业 强无凌弱 众不暴寡 人物殷阜 朝野欢娱。”

隋朝有过繁荣，从文帝时期开始，的确储积了大量的粮食、布

帛。但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掩盖着农民的大量破产。由于文帝杨坚的储积政策是建立在重征赋税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就造成了一方面是隋王朝的府库充溢，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陷于极端的贫困之中的局面。

府库的大量储积，不仅未给隋朝带来富强，恰恰相反，也给欲要推翻隋政权的各种势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这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结局，却是隋文帝所始料未及的。

就此，在贞观二年，唐太宗准确地论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在隋文帝时期，政治上不能听取臣下的意见，独断于己，特别是由于隋文帝晚年喜怒无常，持法严酷，又不能信任大臣，过于杀戮，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加深。当然，隋文帝时期的社会矛盾还未激化到使政权崩溃的程度。隋炀帝即位之后，其残暴的统治大大加快了隋亡的过程。

到了隋炀帝时期，则不仅独断于己，而且“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

譬如在大业六年（公元 611）隋炀帝杨广在洛阳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杨广还先后修建显仁宫、天经宫、晋阳宫、汾阳宫、江都宫等离宫四十余所，并役使丁夫南开大运河，北凿邗沟，还发动了三次征讨辽东的战争。

隋炀帝杨广时期的一系列徭役，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致使“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于是造成了“民不堪命，率土分崩”的局面。百姓只好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去推翻腐朽的专制统治。

承担力役、兵役最繁重的地区是河北、山东。大业七年（公元612），这一地区遭到特大水灾，次年又发生旱灾，当地人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于是农民起义的义旗率先在这里打出。据史籍记载，最早出现的农民运动是在大业七年，由邹平人王薄领导的长白山农民起义。王薄自称“知世郎”曾作有《毋向辽东浪死歌》来号召人民反抗，歌中唱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身着江罗锦背裆。

长稍侵天半，抡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真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歌粗犷豪壮，表达了反抗隋朝暴政，敢于斗争，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气概。在王薄等农民领袖的号召下，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并掀起了反隋斗争的第一个高潮。在农民起义的带动下，大业九年（公元614）隋朝贵族杨玄感趁机起兵，并声称“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出现了。

杨玄感的起兵虽被迅速平定，然而却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它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为更大的农民起义提供了条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民起义由山东、河北迅速向全国各地发展。无数支农民起义军向隋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汇合，形成了三支主要的农民武装力量，即瓦岗军、河北义军和江淮义军。这三支义军成为摧毁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

农民起义军的发展，促使统治阶级内部进一步分化。许多地主势力乘机起兵，豪强武装遍布各地。大业十二年（公元617）底，罗艺在幽州举起了反隋义旗；大业十三年（公元618）二月，鹰扬郎将梁师都起兵于朔方；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联合当地豪强起兵于马

邑 四月 金城府校尉薛举起兵于金城 七月 鹰扬府司马豪族李轨起兵于武威 十月 巴陵校尉董景珍、旅帅郑文秀等起兵于巴陵 拥罗县县令肖铣为王。他们在各地纷纷起兵，使得隋朝政权的覆灭指日可待。

天下豪强纷起的政治局势不可能不对年轻上进的李世民产生影响。

李世民自出生之日起，便身处隋朝由繁荣向衰败剧变的历史时期。在天下纷争的岁月里，他本人也在不断地增长着才干。此时他“见隋室方乱 阴有安天下之志 倾身下士 散财结客 咸得其欢心”。于是，他在政治上的思路逐渐明朗起来。

各地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对尚留在隋统治营垒内的李渊父子，不能不引起深深的触动。此时，李氏父子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继续为隋王朝卖命，以此维持功名利禄，还是改弦易辙，卷入倒隋斗争的洪流？

何去何从，关系到李氏家族的兴衰存亡。此时他们心弦已动，只是在静观时变，小心翼翼地筹划着自己的前途。正是在这种不安分的社会变动中，李世民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跨入了文筹武功的志士旅途。

机会只钟情于有准备的人，时代和家庭为李世民登上政治舞台做了各种准备，一条崭新的道路在他眼前展开。他就是以此为起点，踏上惊险而又辉煌的人生之路的。

5. 临机果断 活用疑兵退敌之计

大业十一年（公元 616）由于雁门之围战役的发生 李世民跟随身为隋将的父亲李渊到太原，以镇压甄翟儿起义军。在先后两

次战争中，年轻志士那勇敢机智的军事才能开始显露。

大业十一年四月间，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于是李渊携家眷至河东。同年八月，炀帝巡视北边，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围攻，由此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事变。

隋朝时，突厥是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早在西魏时期，突厥势力逐渐强大，“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然而到了隋朝初年，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在西面的为西突厥，在东面的为东突厥。不断侵扰隋朝边境的突厥民族，自从其分裂之后，势力衰落，在实力雄厚的隋朝面前，近二十年未敢南侵，让中原人过了一段无外敌袭扰的日子，这也正是隋朝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然而到了隋朝末年，由于炀帝杨广统治残暴，内政腐败，连年用兵，于是东突厥又迅速强大起来，一时成为隋朝北方的重大隐患。

始毕可汗围困炀帝于雁门的重大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雁门郡共辖城池四十一座，此时已被突厥攻占了三十九座，只有雁门和崞县二城没被攻破。

这一天，炀帝杨广一行过了雁门关（今山西省代县）往北进入牧区，正放眼欣赏旖旎的草原风光，忽见远处急驰而来的两匹快马，眨眼间来到杨广面前，从马上跳下一位突厥打扮的人，呈给杨广一封密信。

炀帝杨广展开书信，见是义成公主亲笔写的。义成公主是杨坚宗室的女儿，也即杨广的侄女，当年文帝杨坚把她许配给突厥酋长启民可汗，结成姻亲关系。大业五年（公元610）启民可汗病亡，他儿子咄吉即位，称作始毕可汗。按部落原始婚姻风俗，义成公主又成为始毕可汗的可贺敦（即妻子）。

如此以来，杨广与突厥酋长始毕可汗也是亲戚了。但是，杨广竟无事生非，鼓动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没与他哥哥作对，不曾相

叱吉没并不和杨广一心，而将此事告诉了哥哥，始毕可汗大怒，遂与隋朝断绝了往来。

此时听说炀帝杨广只带领两万骁勇禁卫军，始毕可汗便召集几十万兵马，进攻隋炀帝。义成公主担心隋朝没有防备会吃亏，便写信向叔父杨广密报这个消息。

看罢义成公主的信，杨广吓得立即往回返，哪知刚进入雁门关，始毕可汗即率大军追了过来。由于突厥大军全是骑兵，进军的速度极快，烟尘滚滚而来，转眼间兵临城下，将小城雁门关包围了个水泄不通。

杨广壮着胆子，虚虚地登上北城楼察看敌情，见突厥骑兵之多，一眼望不到边，吓得他冷汗直流。也就在这时，突厥兵一齐往城楼上射箭，一支箭射中杨广头上的皇冠，吓得他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情不自禁地失声大哭起来。

直到哭够了，杨广才想起召集大臣们商量退兵之计。有人提出让皇帝带三千骑兵突围，但大部分人反对，认为三千骑兵要突破几十万大军尽管并非没有可能，但凶多吉少，风险太大，应该派人到四方调兵救援，再派人去突厥让义成公主帮忙。

当时的大臣樊子盖提出了“未若守城以挫其锐”，征四方兵入侵的建议。隋炀帝便把诏书系在木头上，投入汾水，顺流南下，命令各地募兵前来援救。

这时，李世民年仅十八岁，已应募入伍，隶属于屯卫将军定云部下在五台山脚驻扎，此时他向将军定云建议：“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之故也。宜昼则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征喜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

在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前提下，李世民不仅表现出他军事才能的“多旌旗鼓为疑兵”的策略，也表现出他初生牛犊不畏虎

的气概。

“多旌旗鼓为疑兵”也即在一时无法集结援军的情况下制造假象，虚张声势，吓退敌人。

云定将军依了李世民之计，立即制做旗帜筹集钲鼓，短短三天时间，五台山脚下处处飘扬着隋军旌旗，夜里钲鼓声阵阵，不绝于耳。

始毕可汗得到侦得而来的消息，果然以为隋朝来了大量援军，不禁心虚起来。义成公主也派人报告始毕可汗，说突厥有紧急战事，让他立即返回。于是，始毕撤兵而北走。

在解雁门之围的军事战役中，李世民虽然没有通过实力建立的什么功劳，但他初次从军，却献有退敌之计，展现了机智灵活的才华，同时也体现了李世民的“玄鉴深远，临机果断”的性格特点。

6. 以少胜多善用谋 兵家也应青胜蓝

如果说解围雁门是李世民军事生活中的一次牛刀小试的话，而在镇压甄翟儿起义军的战役中，李世民则明显有些锋芒展现了。

大业十二年（公元617）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以后又升为太原留守。因次子李世民少好弓矢，喜谈兵事，又时时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因而李渊把他带在身边，权且把他当作军事参谋来用，而把建成、元吉等留置在河东。这样，李世民就有机会随李渊来到太原，参加了镇压甄翟儿起义军的行动，有了进一步的军事实践。

甄翟儿是魏刀儿起义军的一名将领。大业十一年二月，魏刀儿在上谷自称历山飞，拥众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次年四月，别将甄翟儿又率众骚扰太原。隋朝将领潘长文就是在此役中

被打死的。

李渊率兵前往征讨，至西河郡永安县雀鼠谷，双方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甄翟儿的部众多达二万余人，李渊所率步骑只有五六千而已。史载：

（王）威及三军咸有惧色，帝（李渊，下同）笑而谓威等曰：“此辈群盗，惟财是视，频恃再胜，自许万全。斗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图之，事无不果。所忧不战，战必破之，幸无忧也。”

须臾，贼阵齐来，十许里间，首尾相继。……帝乃分所将兵为二阵，以羸兵居中，多张幡帜，尽以輜重继后，从旌旗鼓角，以为大阵；又以麾下精兵数百骑，分置左右队为小阵。军中莫识所为。

及战，帝遣王威领大阵居前，旌旗从，贼众遥看，以为帝之所在，乃帅精锐竞来赴威。及见輜馱，舍鞍争取。……帝引小阵左右二队大呼而前，夹而射之，贼众大乱，因而纵击，所向摧陷，斩级获生，不可胜数，而余贼党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

这是一场站在维护隋朝统治者的立场上，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役，李渊身为隋将，不得不为。然而，这一段文字描述得畅快淋漓，把李渊驰骋沙场的矫健身姿作了一番尽情的勾勒。此次战役的布阵设置是否出于李世民的建议，不得而知，但和上节李世民提出的“多旌旗鼓为疑兵”是很相似的，也或许是李渊父子灵犀相通，精于战术之缘故，致使此役化险为夷，取得了胜利。

据《旧唐书》记载，由于敌众我寡，李渊陷入义军阵中，“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

——这里对李世民骁勇超众的盛赞，可能有所夸大，但李世民

善于骑射 善用骑兵战术 大有‘所向披靡’的气魄 以少胜多 却也是事实。

出于贵族子弟的立场，李世民积极镇压农民起义军，本不值得肯定，然而封建历史是既定的，社会也是这样发展的，历史风云的变幻是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由此却能看出他的军事才能，这与本书的编纂意志相符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作为一名希图有所作为、正值改造世界壮志的青年，李世民显然比其父亲更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勇气、更少些思想的桎梏。他的可贵处在于，经过太原保卫战中的雀鼠谷战役，他能够领悟到处理农民起义如禹治水，宜疏而不宜堵，单靠镇压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他曾对其父李渊说：“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 终不免罪。”

这种认识便是他后来参与起兵密谋的思想基础。

镇压甄翟儿起义军的战斗，只能算是李世民初历戎阵，小试锋芒。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他的军事才能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李世民毕竟是贵族出身，尽管他已看到隋朝将亡 他自己也已有‘潜图义举’的思想 但面对农民起义 却又毫不手软，将其作为“盗贼”来看并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在这一点上，他和隋朝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也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